田埂上的新枝

农民画艺术家朱碧云的“传”与“承”


朱碧云创作农民画


《立秋—芋香秋收》镜

周晓思 文/摄

今年11月中旬，天一广场，第十一届海丝之路文化和旅游博览会慈溪展厅里，碧画艺术工坊的展台不大：四季口袋笔记本、杯垫、瓷盘等文创产品依次摆开，最上方立着两面手持镜，一面粉，一面蓝，分别画着大公鸡和收芋头的图景。

一位年轻姑娘拿起蓝色镜子照了照，问：“这上面是什么画?”“慈溪农民画。”朱碧云站在展台边答道。

田埂上的画，成了可以揣进包里、摆在案头的物件。从慈溪横河镇到这方展台，她走了21年。

一支笔，两代人

1988年，慈溪被文化部命名为“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”，是全国首批命名的画乡之一。慈溪第一批农民画画家里，就有朱碧云的阿姨孙彩凤。技艺传到朱碧云，如今她是慈溪市非遗传承基地（宁波农民画）的负责人，荣获宁波市“十大农民画艺术家”称号。

小时候放寒暑假，她去阿姨家做客，一住几个星期，总看见阿姨伏在桌前画画。画面色彩斑斓，她只觉得好看。阿姨的画作经常获奖，她也跟着高兴。阿姨有时也递给她一支笔、一张纸：“你家里杨梅怎么摘的呀？水稻怎么种的呀？你就在旁边画。”

真正让她喜欢上画画，是在小学三年级。校长说有绘画比赛，她画了一幅交上去。画完她生病了，请假在家休养。有一天去横河医院，经过七星桥，她看见镇上的宣传窗里贴着自己的画作。

“我赶紧让妈妈停下自行车，跟她说好像看见我的画了。”隔了三十多年，朱碧云讲起这一幕，还是要顿一顿，“小时候的这棵幼苗种下去，很重要。”

1997年，朱碧云中专毕业，回到家乡横河镇，在乡村小学教语文、美术。

2005年，阿姨因为身体原因不再画画，打电话叫来朱碧云，把画笔、颜料、纸都交给她，吩咐道：“你去画吧。”

“我只知道阿姨一直在画画，不知道她画的是农民画，也不知道慈溪有农民画这样一份家底。”她想，那就试试，创作了第一幅作品《家有喜事》，画的是姑妈给要出嫁的姐姐缝喜被。“来缝被子的妇女，要父母健在、儿女双全，有福气的人来缝，寓意是嫁出去的女儿往后日子也像她一样幸福。”

这幅起步之作入选了浙江省群星奖。“第一次尝试农民画创作就有了收获，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。”她说，“于是我下定决心，要坚持画下去。”

笔接过来容易，接下去难。

她给自己定好目标：寒假画一幅农民画、写一篇论文；暑假时间长些，就写一篇论文、画两幅画。平日里，晚上九点以后，孩子安顿好睡下了，她才坐到桌前动笔。这个习惯，她雷打不动地坚持了下来。

“其实也没有想到今后会怎么样。”她说，“以前大家叫我画家，太尴尬了，我这样的不能算画家。”

2005年全省农民画研讨会在慈溪召开，她作为新作者站起来提问：如果把小时候的故事画完了，还能画什么?专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。这个问题，在她心里搁了很久。



彭南村碧画艺术工坊


连环画《阿碧寻梅记》组图之一



《新年福到》

画不完的乡土

答案是她自己走出来的。

下了班，她往山里、田间走；工作累了，就回老家彭南村的地头转一转。横河是农业乡镇，摘杨梅、采茶、挖芋头、采红菱、种稻谷，一草一木都在给她递题目。

渐渐地，她发现，只要往生活里走，题材是画不完的。“我们可以画以前的农村，也可以画现在的农村，还可以画将来的农村。农民画的素材源源不断，它就来自我们的生活。只要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看，题材就取之不尽。”

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，她把对家乡的感情都落在笔下。与传统农民画相比，朱碧云画中的人物、构图、用色有自己的独特之处。“看过我作品的人会这样描述——给人一种很清新、内心很愉悦的感觉。”在她看来，一幅农民画如果能够让人赏心悦目，带来向上向善的力量，它的价值就达到了。

乡土画不完，还因为画的人不止她一个。

2017年，碧云农民画工作室成立，她辞去学校行政职务，把更多精力投入美术教学和工作室运营。

2018年，“碧云·艺课堂”每周四下午开课，面向慈溪市举办公益课堂，场地就在工作室隔壁。每期课程两个月，至今已开课近40期，累计参与近千人次。每周三晚上，她还在慈溪市文化馆夜校授课，一堂课约30人，持续了好几年。夜校学员大多三四十岁，周四下午的课堂里退休人员居多，而来参加研学课的是孩子。“现在老中青少都覆盖了。”她笑着说。

有一年，孩子们来工作室研学。朱碧云指着那幅《家有喜事》问：“你们在画里看到了什么?”孩子们回答：“看到一块红布，里面有个喜字，画了一条龙和一只凤。”她再问：“画面中的人在干什么?”孩子们说不知道。

她告诉孩子们，那是姑娘出嫁之前要缝的被子，又问孩子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被子？孩子们摇头，“我们家的被子是超市买的蚕丝被、羽绒被”。

那天研学结束后，她一个人坐在工作室里思考：农民画承载的不只是一个个画面，还有当地的民俗和历史，得让现在的孩子知道。

于是她开始创作二十四节气系列作品。立春画桃花，清明写采松花、吃松花团，芒种画杨梅，大暑写纳凉。写文、配画，一期一期带着孩子们做研学，孩子们听得睁大了眼睛：“原来朱老师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。”从2021年9月动笔，七十余次采风，五十多张画，这一系列历时五百多天完成。“碧画·二十四节气”后来成了慈溪市委宣传部全民阅读的一个重要品牌。

海外学员也来了。经慈溪市侨联牵线，泰国的大学生、澳大利亚的华裔少年走进碧云农民画工作室。“他们觉得很好奇，中国还有这样的民间艺术。”她说，请华裔孩子来，是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。

让农民画走得更远

“创作一幅农民画需要的时间比较长，文创让画里的东西变轻了，能带走。”朱碧云请来专业设计师，从二十四节气的画里提炼元素做成手持镜，小镜子可以放进包里；又做杯垫、丝巾、茶盘，还有四季口袋笔记本，春夏秋冬一季一本。

今年10月中旬，她随宁波市文艺交流代表团赴韩国大邱。出发前，团里说可以带一些代表宁波本土文化的伴手礼。她选了8套镜子和四季口袋本——精致，也好带。“大邱艺术文化团体总联合会会长收到后很高兴。我跟会长讲，粉色镜子是《立春—大吉大利》，上面的大公鸡图案谐音‘吉’，立春是阳气回升、万象更新的节点；蓝色镜子是《立秋—芋香秋收》，寄托对五谷丰登、一季丰收的祈愿，寓意‘如意’。二者合起来是‘吉祥如意’，在中国是一种美好的祝福。”

回来一个月后，这些文创摆上了第十一届海丝之路文化和旅游博览会的展台。

走出去的不只是文创，画本身也在生长。

今年7月，第十届浙江民间文艺“映山红奖”在北仑颁奖，朱碧云的农民画《千年梅乡在浙里》获评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，这是浙江民间文艺的最高荣誉。

那是一组五幅联图，画了9个月。为了它，朱碧云从横河翠屏山的西边一路往东，到匡堰、到上林湖、到掌起的红色古村落，反复走了好几遍。“作品的立意首先要有高度，那内容来自什么？来自家乡。”

五幅画从“客至山乡喜气来”画到“振兴路上花正开”，把杨梅季从客来、开幕、采摘、出山到产业兴旺，一一铺开。同样是杨梅题材，从前的画作里是船运、肩挑、手推车，如今多了空运。朱碧云说：“农民画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画种，画天画地画自己。”

再往前一步，她把农民画搬进了连环画。连环画尺幅小，精细度要求高，主题要更鲜明。“原来觉得自己画农民画得心应手，真动手画连环画才知道差距所在。”

《阿碧寻梅记》是她第一次用农民画的形式画连环画，入选宁波美术馆今年10月30日开幕的“第九届架上连环画展览”。故事源自到工作室研学的华裔孩子：一个叫阿碧的新西兰女孩，带着爷爷“去找中国的根”的嘱托来到慈溪，见到杨梅树，听奶奶讲杨梅仙子的传说。临走时，她带走一颗杨梅果核：“我终于找到了爷爷说的中国的根。”那颗核，后来在新西兰长成一棵高大的杨梅树。

海燕出版社的编辑由此请她画绘本，书名定为《阿碧的杨梅》，即将出版。“这么好的农民画，要让更多的孩子看到。”出版社编辑说。

“农民画不能只停留于参赛，还要发挥它积极的精神力量，让它保持鲜活的生命力。”朱碧云满怀信心地说：“要用农民画讲好慈溪故事，讲好宁波故事，讲好中国故事。”

21年前，是阿姨把一支笔递到她手里。如今，她把这支笔也递了出去——递给课堂上的人，递给村里的孩子，递给那些把镜子揣进包里、把绘本带回家的人。

锐观察

探寻经典的未尽之意

——舞剧《楼台会》的当代探索


舞剧《楼台会》剧照 （宁波市演艺集团供图）

张芯蕊

一方高达九米的太湖石，一叶悬于半空的扁舟。楼台之上，红装伫立的祝英台与抱琴赴约的梁山伯遥遥相望……今年6月，由宁波市演艺集团打造的原创舞剧《楼台会》在杭州完成全球首演，后又赴西安、济南、郑州等地巡演，并于10月底回到宁波上演。这部取材于梁祝传说的舞剧，以新的叙事结构、人物塑造与舞台语言，展开了一次对经典的当代探索。

从民间传说到越剧，从戏曲电影到小提琴协奏曲，梁祝早已成为几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。在诸多艺术经典之后再“写”梁祝，创作者面临的挑战，不仅是如何讲述一个熟悉的故事，更是如何从中发现新的意义，并为这种发现创造新的艺术形式。

赋予经典新的内涵

不同于传统的梁祝叙事，舞剧《楼台会》将故事收束于祝英台出嫁前夜。梁山伯抱琴赴约，一场楼台相会，勾连起两人过往的悲欢。草桥结拜、三载同窗、十八相送……这些为人熟知的情节，在现实、回忆与梦境的交织中重新展开。

叙事顺序的调转，首先带来的是整个故事情感底色的改变。传统的顺叙让观众见证爱情如何萌生、成长，又如何走向毁灭；《楼台会》则让观众在诀别时刻回望爱情的发生。同样是万松书院的同窗岁月，此刻重温，便多了一层青春不可复得的怅惘；同样是十八相送，那些曾经令人会心一笑的欲言又止，也有了关于错过的悲剧意味。

事件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事件在人物生命中的意义。也正因如此，剧中的“楼台”早已不只是梁祝故事里一个具象的相会地点——它成了一面镜子，一个渡口，是两个人回望平生、叩问内心、直面命运的精神空间。整部舞剧的叙事逻辑，也随之从“事件发生的先后”，转向了“情感涌动的深浅”。

叙事视角的转换，也为重新认识梁山伯与祝英台提供了可能。

长期以来，人们更多是从爱情关系中认识这两个人物。然而，回到梁祝传说本身便会发现，这个故事的起点并不是爱情，而是求学。在遇见梁山伯之前，祝英台已经作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：女扮男装，走出闺阁。而在宁波地方传说中，梁山伯也不只是一位痴情书生，还有出任鄞令、勤政爱民的另一重形象。

舞剧着意发掘梁山伯济世安民的文人底色，同时进一步凸显祝英台独立、坚韧的精神品格。在万松书院的舞段中，创作者不仅描摹了两人同窗共读的青春岁月，还通过学生接济难民等情节，让梁山伯心怀苍生的抱负有了具体的表达。书院里的日子，有少年人的意气风发，也有读书人对世间疾苦的关切。

一个希望通过求学改变自己的人生，一个希望将所学付诸更广阔的社会实践。两个经典人物开始从相对单一的爱情关系中走出来，显露出各自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。

而无论是叙事视角的转向，还是人物内涵的拓展，最终都使梁祝的悲剧有了进一步阐释的空间。

在舞剧《楼台会》中，梁祝二人所失去的，不仅是相爱相守的机会，也是他们曾经期待的另一种人生。这一点，在上下半场的情节对照中尤为鲜明。上半场的万松书院，是两个年轻人生命中难得的自由时光。他们同窗共读、畅谈理想，对未来充满憧憬。下半场，随着两人走出书院，现实的重压接踵而至：一排排聘礼被推上舞台，祝英台的婚姻成为家族利益的筹码；胸怀济世理想的梁山伯，也在逐渐看清现实的晦暗，有心改变，却无力撼动既有的社会秩序。

当自由舒展的两个年轻人，各自陷入了人生的困境，这场悲剧的内涵也从个体情感与封建礼教的冲突，进一步延伸至个人理想与现实处境之间的矛盾。

这恰恰也是梁祝故事能够与当代人产生共鸣的地方。在主创团队看来，今天的人们早已拥有更为广阔的人生选择，但如何在现实的种种限制中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如何在外界的期待中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，依然是值得思考的人生命题。而即便是如此理解梁祝，也并没有减损爱情的价值。对于这两个年轻人而言，选择彼此，本身就是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的一部分。他们对爱情的坚守，也是对自我选择的坚守。当爱情与各自的人生理想紧密相连，这场悲剧便有了更深的分量。

创造新的审美样式

对经典有了新的认识，还需要找到与之相匹配的艺术表达。对于舞剧《楼台会》而言，这种探索尤其体现在两个贯穿全剧的意象上：一方太湖石，一只蝴蝶。

太湖石是全剧最醒目的舞台装置。在中国传统园林中，山石是文人寄托情志、观照天地的审美对象。《楼台会》则将原本置于庭院中供人赏玩的太湖石，“放大”至九米之高，演员们在山石间攀援、穿行、起舞，舞蹈的空间也由平面向立体延展。

尺度的改变，带来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改变。在园林中，人是山石的观赏者；而在舞台上，人的身体置于巨大的山石之间，山石便成为影响人物行动的力量。它时而是书院中承载青春记忆的山水，时而是横亘于恋人之间难以逾越的屏障。同一方山石，随着人物处境的变化，生发出不同的意味。

有意思的是，剧名虽为《楼台会》，舞台上却没有一座具象的楼台。创作者以太湖石间延伸而出的一叶扁舟，承载楼台相会的意象。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舟上相聚、起舞，在巨石的映衬下，两人的身影愈显单薄。石是坚硬的，舟是漂浮的，巨石的厚重与一叶扁舟的轻盈、现实的阻隔与恋人短暂相聚的美好，在同一舞台空间中形成了鲜明的张力。

如果说太湖石让人物面对的现实阻隔有了形状，那么，蝴蝶则让人物难以言说的内心活动有了形状。

在梁祝故事中，蝴蝶通常在悲剧的终点出现，寄托着人们对爱情超越生死的浪漫想象。《楼台会》却将这一意象贯穿于人物的生命历程之中，并从另一个哲学寓言——“庄周梦蝶”中汲取灵感。

《楼台会》借用这一典故，巧妙地回应了梁祝故事中有关身份的命题。舞段《梦蝶》中，女子群舞身着宽大的白色透明袍服，手持蝴蝶。随着衣袍的穿脱，书生与女子的形象交替显现，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。据总编导吕梓民的创作阐释，这一舞段既是梁山伯的梦，也是祝英台的梦：一边是梁山伯对祝英台身份的隐约察觉，一边是祝英台深藏于心的求知愿望与自由向往。

借由梦境，现实中无法辨明的身份、无法言说的情感、无法实现的愿望，获得了自由表达的空间。

除此之外，蝴蝶还是贯穿全剧的一条情感线索。在几段以蝴蝶为意象的群舞中，蝴蝶的颜色由白转粉，最终变为黑色。从同窗时的纯真美好，到情愫渐生时的甜蜜悸动，再到面对命运时的沉重悲凉，色彩的变化映照着人物内心的起伏，也传递着整部舞剧的情绪变化。

由此可见，从梦蝶到化蝶，蝴蝶的意义也在这部剧目中发生变化。它不再只是爱情悲剧之后的浪漫慰藉，也成为人物追求自由、突破既定身份的精神寄托。

以山石写人的处境，以梦蝶写人的内心。两组意象的运用，也让《楼台会》对魏晋美学的理解，并不止于褒衣博带的服饰、清逸疏朗的舞姿。魏晋时期，文人寄情山水、体悟自然，对个体精神世界的观照亦日益深入。《楼台会》对梁祝故事的重新阐释，恰恰与这种精神追求形成呼应：无论是梁山伯的济世理想，还是祝英台对知识与自由的向往，都指向个人价值的实现。

传统文化的舞台呈现，并不天然等同于传统美学的当代表达。而舞剧《楼台会》的探索表明，传统意象的价值，不只在于它有多美、承载着多少文化记忆，更在于它能否在新的作品中承担新的艺术功能，又在观众的理解中获得新的意义。